

中国廉政史鉴

思想理论卷 ③

中

李洪峰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中国廉政史鉴

李洪峰题



思想理论卷
③

李洪峰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第六章 唐代廉政思想

唐高祖李渊于公元 618 年建立了唐朝，以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为首都。公元 690 年，武则天改国号“唐”为“周”，迁都洛阳，史称“武周”，也称“南周”，直到公元 705 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。唐朝在天宝十四载（755 年）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，至天祐四年（907 年）梁王朱温篡位灭亡，共延续了二百八十九年。唐朝在文化、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

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。这一时期的廉政思想，尤以用人和纳谏方面的论述最为系统和深刻，极具新意。

概述

唐朝时期，廉政言论主要集中在民本思想、节俭、用人和纳

谏、廉洁四个方面，许多论述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前代王朝。

一、民本思想

重民是中国政治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，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比较重视的廉政层面之一。从盘庚的“重民”、周公的“保民”、孔子的“爱民”到孟子的“民贵君轻”、荀子的“君舟民水”，再到汉朝以来形形色色的不断丰富充实的民本思想，无一不反映出古代政治思想家们对民众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。及至唐代，唐王朝的政治家、思想家都有浓厚的民本思想，他们把百姓看成国家的根本，认为治理好国家必须要使百姓安居。

唐代的重民思想与开国两代皇帝李渊和李世民有密切关系。短命的隋王朝，是唐代帝王的一面镜子。隋朝的盛衰兴亡之快，不能不引起李渊和李世民的认真思考。他们目睹隋末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的致命打击，认识到农民的反抗是迫于“赋重役繁，官吏贪求，饥寒切身”所致。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治国方针的《贞观政要》，就集唐代民本思想的大成。早在贞观之初，李世民就对大臣说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”^{〔1〕}并把“国以人为本”作为执政的根基：“凡事皆须务本。国以人为本，人以衣食为本，凡营衣食，以不失时为本。”^{〔2〕}后来他进一步解释道：“夫治国犹如栽树，本根不摇，则枝叶茂荣。君能清静，百姓何得不安

〔1〕 吴兢撰，裴汝诚等译注：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一《君道第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（下同），第1页。

〔2〕 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八《务农第三十》，第376页。

乐乎？”^{〔1〕}《贞观政要》中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：“国以民为本，人以食为命。”^{〔2〕}

作为开唐第二代皇帝的李世民，他的民本思想对后代帝王有很深的影响。武则天曾对此阐释道：“夫衣食者人之本也，人者国之本。人恃衣食，犹鱼之待水；国之恃人，如人之倚足。鱼无水则不可以生，人无足则不可以步。”^{〔3〕}

此外，唐代的思想家对民本思想也多有论述。孔颖达认为：“政之所为，在于养民。养民者，使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此六事惟当修治之；正身之德、利民之用、厚民之生，此三事惟当谐和之。”^{〔4〕}他把“利民之用”和“厚民之生”作为重要的“三事”中的“两事”来对待。“天子之在天位，职当牧养兆民。”^{〔5〕}“民惟邦国之本，本固则邦宁。”^{〔6〕}都是对民富则国兴的论述。陆贽也认为：“人者，邦之本也。”^{〔7〕}“是以人为本，以财为末，人安则财赡，本固则邦宁。”^{〔8〕}也和孔颖达的认识基本一致。白居易则作了较深入的论述：“臣观前代：邦之兴，由得人也；邦之亡，由失人也。得其人，失其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天地不能顿为寒暑，必渐于春秋；人君不能顿为兴亡，必

〔1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一《政体第二》，第30页。

〔2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八《务农第三十》，第378页。

〔3〕武则天：《臣轨·利人章》，《诸子集成续编十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（下同），第164页。

〔4〕孔安国传，孔颖达正义：《尚书正义》卷第四《虞书·大禹谟第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（下同），第127页。

〔5〕《尚书正义》卷第七《夏书·五子之歌第三》，第263页。

〔6〕同上书，第264页。

〔7〕陆贽著，刘泽民校点：《陆宣公集》卷十一《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（下同），第94页。

〔8〕《陆宣公集》卷二十二《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》，第247页。

渐于善恶。善不积，不能勃焉而兴；恶不积，不能忽焉而亡。善与恶，始系于君也；兴与亡，终系于人也。”^{〔1〕} 他从国家兴亡的角度阐释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。

二、节俭

唐代帝王及思想家对于节俭是相当重视的，这与唐初两代帝王唐高祖李渊、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密不可分。唐太宗李世民曾说：“奢侈者可以为戒，节俭者可以为师矣。”^{〔2〕} 并对于帝王的节俭品德作了论述：“夫圣世之君，存乎节俭。富贵广大，守之以约；睿智聪明，守之以愚。不以身尊而骄人，不以德厚而矜物。”^{〔3〕} 唐朝后代皇帝对于节俭也多有论述。代宗李豫曾说：“爱人之体，先以博施；富国之源，必均节用。”^{〔4〕} 文宗李昂曾下诏：“俭以足用，令出惟行，著在前经，斯为理本。”^{〔5〕}

对于园陵制度，唐高祖李渊在死前曾下诏曰：“园陵制度，务从俭约。”^{〔6〕} 这就给园陵制度作了一个规定。唐朝后代帝王都遵循这一原则。李世民曾下诏：“至如雕镂器物，珠玉服玩，若恣其骄奢，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。自王公已下，第宅、车服、婚嫁、丧葬，准品秩不合服用者，宜一切禁断。”^{〔7〕} 李隆基的规定更为

〔1〕 丁如明、聂世美校点：《白居易全集》卷第六十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（下同），第854页。

〔2〕 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六《俭约第十八》，第299页。

〔3〕 李世民：《帝范·崇俭第八》，《诸子集成续编十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（下同），第25页。

〔4〕 《旧唐书·本纪第十一》，第284页。

〔5〕 《旧唐书·本纪第十七下》，第537页。

〔6〕 《旧唐书·本纪第一》，第18页。

〔7〕 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六《俭约第十八》，第295页。

严格：“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，明为节制：冥器等物，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；园宅下帐，并宜禁绝；坟墓茔域，务遵简俭；凡诸送终之具，并不得以金银为饰。如有违者，先决杖一百。”〔1〕

三、用人和纳谏

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，从根本上说就是“人治”。贞观之治就是用人之治，说明用人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涉及江山安危、人民祸福的大事，如果不予以高度重视，就会蹈隋炀帝之覆辙。

唐太宗鉴于隋亡的教训，充分认识到官吏是“治乱所系”，用人是国家兴亡的关键。他对于用人极其重视：“致治之本，惟在于审。量才授职，务省官员。……若得其善者，虽少亦足矣；其不善者，纵多亦奚为？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，比于画地作饼，不可食也。”〔2〕且认为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兴亡，必须谨慎：“用得正人，为善者皆劝；误用恶人，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，无功者自退；罚当其罪，为恶者戒惧。故知赏罚不可轻行，用人弥须慎择。”〔3〕对于人尽其才，李世民论述道：“故明主之任人，如巧匠之制木，直者以为辕，曲者以为轮；长者以为栋梁，短者以为栱角。无曲直长短，各有所施。明主之任人，亦由是也。智者取其谋，愚者取其力，勇者取其威，怯者取其慎，无智愚勇怯，兼而用之。故良匠无弃材，明主无弃士。”〔4〕

〔1〕《旧唐书·本纪第八》，第174页。

〔2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三《择官第七》，第129页。

〔3〕同上书，第134页。

〔4〕《帝范·审官第四》，《诸子集成续编十》，第15—16页。

唐代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对用人思想也作过自己的思考，对于唐代帝王的用人思想也有重大影响。孔颖达认为：“人之在位者有才能、有所为，当褒赏之，委任使进其行，汝国其将昌盛也。凡其正直之人，既以爵禄富之，又复以善道接之，使之荷恩尽力。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于汝国家，是人于此其将诈取罪而去矣。于其无好德之人，谓性行恶者，汝虽与之福，赐之爵禄，但本性既恶，必为恶行，其为汝臣，必用恶道以败汝善。言当任善而去恶。”^{〔1〕}认为任善而去恶是帝王重要的用人之道。魏徵认为所任用之人的才行是最需看重的：“知人之事，自古为难，故考绩黜陟，察其善恶。今欲求人，必须审访其行。若知其善，然后用之，设令此人不能济事，只是才力不及，不为大害。误用恶人，假令强干，为害极多。但乱世惟求其才，不顾其行。太平之时，必须才行俱兼，始可任用。”^{〔2〕}唐代重要思想家陆贽更进一步，认为核才取吏有三种方法：“夫核才取吏，有三术焉：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，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。如此则高课者骤升，无庸者亟退。其余绩非出类，守不败官，则循以常资，约以定限。故得殊才不滞，庶品有伦。”^{〔3〕}

唐代在纳谏方面的论述集历代之大成，且为后代所范。这与唐太宗李世民有密切关联，他和臣下的关系为进谏与纳谏作了一个很好的典范。李世民曾说：“夫为人臣，当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所以共为治也。”^{〔4〕}对大臣的职责进

〔1〕《尚书正义》卷第十一《周书·洪范第六》，第463页。

〔2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三《择官第七》，第134页。

〔3〕《陆宣公集》卷二十一《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》，第240—241页。

〔4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一《君道第一》，第13页。

行了界定。思想家陆贽认为：“是知谏而能从，过而能改，帝王之美，莫大于斯！”〔1〕他把帝王能否纳谏作为帝王思想评定的重要方面。

四、廉洁

唐朝极其重视大臣的廉洁，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廉洁多有论及。唐太宗李世民曾说：“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，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，禄秩优厚，一年所得，其数自多。若受人财贿，不过数万，一朝彰露，禄秩削夺，此岂是解爱财物？规小得而大失者也。昔公仪休性嗜鱼，而不受人鱼，其鱼长存。且为主贪，必丧其国；为臣贪，必亡其身。”〔2〕对于贪污的危害作了分析，并且从道德上进行了探讨：“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，以害及身命，使子孙每怀愧耻耶？卿等宜深思此言。”〔3〕

唐文宗李昂曾论及卿大夫职业操守：“卿大夫者，下人之所视，远方之所仿，若非恭俭克己，廉直任人，而望其服从，固不可得。”〔4〕武则天的《臣轨》专辟《廉洁》一章，论及廉洁的重要性：“清静无为，则天与之时；恭廉守节，则地与之财。君子虽富贵，不以养伤身；虽贫贱，不以利毁廉。知为吏者，奉法以利人；不知为吏者，枉法以侵人。理官莫如平，临财莫如廉。廉平之德，吏之宝也。非其路而行之，虽劳不至；非其有而求之，虽

〔1〕《陆宣公集》卷十三《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》，第116页。

〔2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六《贪鄙第二十六》，第338页。

〔3〕同上书，第340页。

〔4〕《旧唐书·本纪第十七下》，第551页。

强不得。知者不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，是以远害而名彰也。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，守清以保其身。富财不如义多，高位不如德尊。”^{〔1〕}重在从道德的角度，对大臣的廉洁情操进行论述。

思想家孔颖达指出了人贪财的本性：“财利，人之所贪，非义而取，谓之苟得，故记人戒之。今有财利，元非两人之物，两人俱临而求之，若苟得入己，则伤廉隅，故郑云：‘为伤廉也。’”^{〔2〕}认为对财利要取之有道。思想家、政治家陆贽指出了帝王也需廉洁，这对于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进步：“圣人之立教也，贱货而尊让，远利而尚廉。天子不问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百乘之室，不畜聚敛之臣。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？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，伤风教而乱邦家耳。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棧之积者，匹夫之富也；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，天子之富也。天子所作，与天同方：生之长之，而不恃其为；成之收之，而不私其有。付物以道，混然忘情，取之不为贪，散之不为费，以言乎体则博大，以言乎术则精微。”^{〔3〕}他认为帝王和臣下的廉洁都是应该而且必需的。而唐德宗认为适当接受下属的小贿是可行的，并且劝陆贽可以接受。对此，陆贽作了详细的论述：“陛下责臣以清慎太过，斯谓圣明；陛下虑事之不通，有乖理道。或恐贪婪之辈，务逞无厌之求，巧陈异端，惑乱圣听，稽诸事实，则甚不然。夫以胥吏末流，苞苴微贶，苟或违道，臣犹知惭，况乎公卿大臣之间，方岳连帅之任，岂资纳贿，然后致诚？若因财利交欢，是

〔1〕《臣轨·廉洁章》，第158—159页。

〔2〕孔安国传，孔颖达正义：《曲礼上第一》，《礼记正义》卷第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（下同），第10页。

〔3〕《陆宣公集》卷十四《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》，第126页。

以姑息为事，既乖直道，必有过求，遂之则法度浸隳，阻之则觖望弥甚，为害如此，国何赖焉！”^{〔1〕}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帝王让贪污都不贪污的陆贽。

政治家、文学家白居易在《策林》中，分析了大臣贪污的原因，认为主要是俸禄不均，为此，要去除贪污，就需“厚其禄”，较早地提出了高薪养廉的思想：“臣闻为国者，皆患吏之贪，而不知去贪之道也；皆欲吏之清，而不知致清之由也。臣以为去贪致清者，在乎厚其禄、均其俸而已。夫衣食阙于家，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，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？冻馁切于身，是巢、由、夷、齐不能固其节，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？臣伏见今之官吏，所以未尽贞廉者，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。不均者，由所在课料重轻不齐也；不足者，由所在官长侵刻不已也。其甚者，则有官秩等而禄殊，郡县同而俸异。或削夺以过半，或停给而弥年，至使衣食不充，冻馁并至。如此，则必冒白刃、蹈水火而求私利也，况可使抚人字物，断狱均财者乎？夫上行则下从，身穷则心滥。今官长日侵其吏，而望吏之不日侵于人，不可得也。盖所谓渴马守水，饿犬护肉，则虽日用刑罚，不能惩贪而劝清必矣。陛下今欲革时之弊，去吏之贪，则莫先于均天下课料重轻，禁天下官长侵刻，使天下之吏，温饱充于内，清廉形于外，然后示之以耻，纠之以刑。如此，则纵或为非者，百无一二也。”^{〔2〕}

在唐代帝王中，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的廉政言论是值得注意的。记载唐太宗及大臣间言论的《贞观政要》，体现了许多政治家的治国思想，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典范。并且，唐太宗李世民

〔1〕《陆贽公集》卷十七《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》，第182页。

〔2〕《白居易全集》，第878页。

专门写了《帝范》一书，作为唐朝后代帝王学习的范本，对于如何加强帝王的思想修养、如何治国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。所以，唐朝后代帝王的许多治国、安民、反腐思想，都深受《帝范》的影响。武则天专门写了《臣轨》一书，对于大臣的节操作了规定。全书二卷十篇，分国体、至忠、守道、公正、匡谏、诚信、慎密、廉洁、良将、利人十章，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，论述为人臣者需正心、诚意、爱国、忠君之道，作为臣僚的座右铭。

在唐代政治家、思想家中，孔颖达、魏徵、陆贽的廉政思想较为重要。他们的廉政思想，在上面的论述中已有所体现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第一节 唐太宗李世民

【人物简介】

唐太宗李世民（599—649），唐高祖李渊次子。隋末与其父起兵推翻隋王朝。公元618年李渊即帝位后，建国号为唐。李渊封李世民为尚书令。不久，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。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李世民建功甚多，但身为次子，不能继承皇位。公元626年，李世民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被立为太子，逼唐高祖李渊退位，自己称帝，是为唐太宗。次年（627年）改元贞观。唐太宗即位后，居安思危，任用贤良，实行轻徭薄赋、疏缓刑罚的政策，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、军事改革，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、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。在位二十三年，其统治时期被誉为“贞观之治”。

唐太宗的廉政思想主要反映在《贞观政要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以及他所撰写的《帝范》等书中。他对于君民关系、纳谏、倡俭反奢方面都有较深刻的论述，他的廉政思想开唐朝历代帝王风气，为唐朝后代帝王留下了大量的相关言论和著述。其《帝范》作为唐王朝皇家必读经典，对唐朝后代帝王的影响深远。

为君之道，先存百姓

【原文】

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；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万姓为之解体，怨讟^①既作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^{〔1〕}

【注释】

①怨讟（dú）：痛恨而发出怨言。

【译文】

做君主的法则，必须首先要让百姓存活；假如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，就好比割掉大腿上的肉来填充肚子，尽管肚子吃饱了，人却死了。如果想要安定天下，必须首先端正自身，从来

〔1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一《君道第一》，第1页。

不会有身子端正而影子歪斜，上层治理良好而下层动乱的。我经常想，能伤害自己身体的并非身体外面的东西，而都是由于内心贪婪成性、过度放纵自身的欲望才酿成祸患。如果一味追求口腹之欲，沉溺于声色，欲望越多，损害也就越大。这样做不仅妨碍政事，而且又侵扰百姓。如果再说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，百姓就会因此而人心涣散，怨言四起，叛乱的事情也会发生。每当我想到这些，就不敢放纵自己，贪图安逸享乐了。

【评述】

这是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的对话，体现了唐太宗的国家治理观。唐太宗显然接受了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，提出治理国家要以百姓生存为先。对于君主自身行为而言，他信奉孔子提出的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，“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的观念，认为君主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为民表率，如此才能做到万众归心，国家安定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唐太宗不仅认识到了这点，更是身体力行，成为后世君主的典范。

人臣需直言进谏

【原文】

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，务在骄奢，不复留心治政。何曾退朝，谓其子劭曰：“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，但说平生常语，此非贻厥子孙者，尔身犹可以免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等必遇乱死。”及孙绥，果为淫刑所戮。前史美之，以为明于先见。朕意不然，谓曾之不忠，其罪大矣。夫为人臣，当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

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所以共为治也。曾位极台司^①，名器崇重，当直辞正谏，论道佐时。今乃退有后言，进无廷诤，以为明智，不亦谬乎！危而不持，焉用彼相？公之所陈，朕闻过矣。当置之几案，事等弦、韦^②。必望收彼桑榆^③，期之岁暮，不使康哉良哉^④，独美于往日，若鱼若水，遂爽于当今。迟复嘉谋，犯而无隐^⑤。朕将虚襟静志，敬伫德音。^{〔1〕}

【注释】

①台司：指三公之位。

②弦、韦：弦指弓弦，韦指兽皮。古人佩弦以自警性缓，佩韦以自警性急。后来就用弦韦比喻朋友规劝。

③桑榆：本指日落时余光所在。此借指晚年。

④康哉良哉：典出《尚书·益稷》。指诸事安宁、大臣贤能。

⑤犯而无隐：语出《礼记》。对君王直言相劝。

【译文】

我听说晋武帝在灭吴统一中国之后，就变得骄奢淫逸，不再留心治理国家。大臣何曾有一次退朝后回家对他儿子何劭说：“我每每看到皇上不再谈论治理国家的长远打算，只是说一些日常俗事，不像把江山传给后代的样子，你还可以免祸吧。”然后指着几个孙子说：“到你们这代必定要在大乱中丧生了。”后来他的孙子何绥，果然被人滥用刑罚处死。过去的史书上都曾赞美过何曾，说他有先见之明。我却觉得不然，何曾是个犯有不忠大罪的人。

〔1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一《君道第一》，第13页。

因为作为一个臣子，应当在上朝时考虑如何尽忠，退朝后想着如何补过，君王有美政时顺势引导，有过错之处时则加以匡正，这样君臣才能共同治理好国家。而何曾位列三公，名高权重，理应直言进谏，以正道辅佐时政，但他却在背后发出那番议论，进见君王时不直言进谏。后人把他的言行看成明智的事情，这不是太荒谬了吗！如果国家在危险时还袖手旁观，那还要你这个宰相干什么！现在看到你奏疏中的陈述，我认识到问题所在。我要把它放在案头，当成良友的规劝，让它在我的晚年也充分发挥作用。我希望“大臣是多么贤能，诸事是多么安宁”的赞颂之声，不仅仅出现在古代虞舜时代，而像刘备对诸葛亮所说的“犹鱼之得水”的情景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对于你的嘉言良谋我已答复迟了，希望你直言进谏不必隐讳，我一定会虚心地静下心来，恭敬地等待着你提出的宝贵意见。

【评述】

魏徵在上疏中告诫唐太宗要以历代兴亡为殷鉴，勤于修身，持正守公，推行仁政，爱护百姓。他提出了“十思”的观点：“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”对此唐太宗虚心接受，并盛赞他的直谏行为。他以西晋何曾为例，后人以为何曾具有先见之明，唐太宗则对其持否定与批判态度，认为他的行为不是人臣之举。他认为真正的人臣应该如魏徵一般“犯而无隐”，从而鼓励臣子进谏。

徭役不兴，百姓安乐

【原文】

贞观九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往昔初平京师，宫中美女珍玩，无院不满。炀帝意犹不足，征求无已，兼东西征讨，穷兵黩武，百姓不堪，遂致亡灭。此皆朕所目见，故夙夜孜孜^①，惟欲清净，使天下无事，遂得徭役不兴，年谷丰稔^②，百姓安乐。夫治国犹如栽树，本根不摇，则枝叶茂荣。君能清净，百姓何得不安乐乎？”^{〔1〕}

【注释】

①夙夜孜孜：日夜不停地劳碌。夙，早。孜孜，勤勉不怠。

②丰稔（rěn）：丰收。稔，庄稼成熟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九年，唐太宗对待从的大臣们说：“当年隋朝刚刚平定京都长安时，宫中的美丽女子、珍奇异宝充盈各个宫院。即使这样，隋炀帝还不满足，仍搜求不止，再加上连年用兵，东征西讨，穷兵黩武，百姓实在无法忍受，这就导致了隋朝的灭亡。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，所以我总是日夜不停地劳碌，只求能够做到清静无为，使得天下没有动乱之事。于是没再大兴徭役，粮食年年丰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治国就好比种树，如果树根牢固而不动摇，那么

〔1〕《贞观政要译注》卷第一《政体第二》，第30页。